

专访济南大学公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国茂

金融改革或变异为利益集团侵吞民资

■ 本报记者 李金玲

5月19日,“第一届中国公司金融论坛”在泉城山东济南举行。本次论坛云集国内理论界、学术界最高端和最前沿的思想和观点,《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会议期间采访了济南大学公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孙国茂教授。

围绕当前新一轮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孙国茂提出,要以制度创新推动金融改革。他表示,目前国务院确定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任务,全部是关于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的改革或创新,几乎没有涉及制度创新和制度设计。不难理解,如果没有制度创新,那么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的改革和创新必然空间有限且难以持续。

新一轮金融改革仅是局部思维

《中国企业报》:自从3月28日,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确定十二项金融综合改革主要任务以来,围绕我国新一轮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包括理论界、实务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骤然升温,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分歧很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孙国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新一轮金融改革的理论问题或者说金融改革所涉及的重大利益关系问题没有厘清,也可以说是没有形成共识。那么,要想完成新一轮金融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真正实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先解决重大理论问题。

自2010年以来,民间借贷市场迅速蔓延,已有研究表明,目前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自发形成的民间金融天然地带有庞氏融资特征,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的定义,所谓庞氏融资可以理解为,无论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都难以偿还的融资。大量民间金融正在演变成为庞氏融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担忧。这一轮金融改革缘起于民间借贷,于是,很多人自然认为本轮金融改革的目标就是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和阳光化。

仅仅把民间金融作为改革重点无法解决整个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甚至有学者提出,目前推出的改革措施“最后会演化为利益集团侵吞掠夺民间资本的场面”。因此,新一轮金融改革应当把消除金融压抑、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作为金融改革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

很显然,正在实施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是按照局部改革的思路进行的,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受强烈质疑。众所周知,由金融的本

质所决定的金融市场功能就是促进社会资源在更大的空间进行优化配置,很难说是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经济金融化,还是经济金融化导致了经济全球化。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历史都表明,金融市场一旦形成是很难进行区域分割的,即使可以分割,其经济成本也非常巨大,这也是为什么局部金融风险通常会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新一轮跑马圈地直指金融资源

《中国企业报》: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公开表示,“因为金融市场是全国性市场,单凭地方不好改变。”与您的观点不谋而合。对于学术界质疑温州金融改革的声音,您是持怎样的观点?

孙国茂:不仅仅是吴敬琏先生这样认为。著名经济学家夏斌也提出,金融改革不谋全局,难谋一隅。不久前,北京大学召开的“从温州改革看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与规则”座谈会上,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教授对温州金融改革措施提出批评,认为温州金融改革是个伪命题,他们的依据是,原来不允许设立的公司和交易所现在允许设立,原来不允许私人向银行入股现在允许了,这只是放开了一部分金融功能,而不是金融的本质变化。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后,广东、上海、天津、深圳和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也推出了一系列金融创新试点办法。可以预见,在局部金融改革条件下,以获得更多金融资源和政策资源为目的新一轮“跑马圈地运动”大幕正在拉开。

民间金融的大量产生其实是金融抑制的结果,而金融抑制则是金融制度不合理或者制度体系与金融市场运行不匹配的结果。目前,国务院确定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任

务,全部是关于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的改革或创新,几乎没有涉及制度和制度设计。不难理解,如果没有制度创新,那么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的改革和创新必然空间有限且难以持续。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彭冰认为,民间借贷是自发的和非脆弱的金融秩序,必须从三个方面的法律措施进行保护,一是遵守契约精神,二是用法律约束债权人,三是完善破产程序。只有突破现有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性障碍,才能支持民间借贷,才能使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

高度警惕硬币另一面的“父爱主义”

《中国企业报》:您刚才所说要以制度创新推动金融改革,而制度的创新和设计源于政府,作为制度的设计者和制度供给者,政府在新一轮金融改革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一旦金融市场画地为牢,结果是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

孙国茂:回顾我国30多年经济改革历程,金融改革为什么会严重滞后?原因在于总是把业务创新当成金融创新,总是以业务创新可以推动金融改革。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以制度创新推动金融改革,当制度创新发展后,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的创新将会变得异常活跃,迅猛发展。

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一直是由政府主导进行的。今天,这种“父爱主义情结”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相反,还在进一步强化和延续。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金融市场的运行与实体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金融市场的运行不仅有它自身的规则,而且金融的性质决定了它内在的脆弱性。

30年的经验表明,政府主导经济改革的结果有两个,一是经济趋向国家垄断化,二是宏观调控常态

化。所谓的国家垄断其实就是以行政方式配置资源取代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现在,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在新一轮金融改革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是让政府像调控实体经济一样继续按照政府意志来主导新一轮金融改革,还是遵循金融市场规则来进行新一轮金融改革?或者说究竟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规则主导新一轮金融改革?因为,两种改革主导模式所产生的结果会大相径庭。

政府主导金融改革的另一个结果是,政府信用取代商业信用。信用是金融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金融市场与一般商品市场的本质区别在于金融市场存在两种信用形式:政府信用和商业信用。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两种信用的市场功能并不相同,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无法相互替代。从以往的经验看,政府主导金融改革势必会把政策和政府信用作为资源使用,并且参与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中国金融市场中,很多时候政府和市场主体难以区分),结果是政府信用取代商业信用,最终使金融市场功能发生异化。从现实情况看,地方政府“跑马圈地”和中央政府的“扩权运动”已经证明这一点。

《中国企业报》:那么,政府究竟应当在新一轮金融改革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孙国茂: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以市场规则主导金融改革并非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首先,作为制度设计者和制度供给者,政府为金融市场运行和金融机构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其次,作为市场监管者,政府应当按照宏观审慎监管原则对市场主体和市场运行进行监督,保护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最后,作为“最终贷款人”和“最终责任人”,政府还要负责化解金融市场产生的各种风险,最大限度地减少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损失。

27家企业推出校车品种

校车渐成客车市场独立投资品种

■ 本报记者 穆瑞

刚性需求下的中国校车市场在全社会关注下,被前所未有地提高到国家高度,从而开启了中国校车市场的蓬勃发展,全面覆盖、专业、安全成为社会对于校车的预期。

在“北京国际道路运输、城市公交车辆及零部件展览会”上,参展的27家整车企业几乎都推出了自己的校车产品,一辆辆“长鼻子”、“国标黄”校车成为耀眼的明星,受到所有参观展会人士的关注,校车已经正式成为中国客车家族的一个独立的新成员。

占到客车市场20%份额

经专家测算估计,全国大概有9000万个孩子需要乘坐校车,但是目前我们的专业校车保有量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需求。中国校车,从2012年1—2月销量已经占客车市场份额的20%强。国家对于校车的相关政策陆续正式颁布,整个社会在持续聚焦校车,整个客车产业链都积极地投入了校车的研发推广。

中国客车统计信息网数据显示,今年2月,50家企业共销售各类客车1.43万辆,同比增幅达到了90.99%,这是最近10年来客车行业2月份的销量新记录。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分会副秘书长余振清分析,除春节因素外,校车销售启动对客车市场的贡献很大。

从销量结构来看,销量主要集中在6—9米区间校车,该区销量为3796辆,市场份额达82.94%;其中,6—7米的校车销售1618辆,占比35.35%,7—8米的校车销售1581辆,占比34.54%,8—9米的校车销售597辆,占比13.04%。11米以上的校车无销售量。

从区域分布来看,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除了新疆、西藏、香港、澳门以外,已有30个省实现了校车销售。其中,销量在300辆以上的有5个,广东635辆,占校车总销量的13.87%;河南581辆,占比12.69%;广西460辆,占比10.05%;山东340辆,占比7.43%;黑龙江318辆,占比6.95%。

从企业表现来看,50家企业中,有19家企业实现了校车销售。宇通客车、保定长安、东风客车、桂客集团、河南少林、中通客车位列前6位。其中,宇通客车今年前两个月销售校车1856辆,超过去年全年的销量,占校车总销量的比例达到了40.55%;保定长安销量501辆,占比10.95%;东风客车销量413辆,占比9.02%;桂客集团销量378辆,占比8.26%;河南少林销量298辆,占比6.51%;中通客车销量285辆,占比6.23%。

2012年1—4月份校车销量为8490台,已经远远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量。

余振清认为,校车市场的启动是保持今年客车销量略有增长的主要因素,不仅支撑了中型客车的增长,也缩小了轻型客车的下降幅度。

市场预期4000亿

东方证券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潜在的专用校车需求量约为100万辆,潜在市场需求规模达4000亿元人民币。

5月,工信部发布了《专用校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2年6月1日。这也是工信部首次对某一类具体汽车产品设立生产准入门槛。业内人士指出,一旦校车安全得到保障,在财政补贴及正常市场需求推动下,校车市场蛋糕或将增至4000亿元。

宇通客车董事长汤玉祥表示:“校车推广将带动至少400亿元的产业链,它创造的是社会价值,包括创造就业岗位和消费,400这个数字都是保守的估计。”他今年两会中提交的就是《关于大力推广使用专用校车的建议》的议案。

其实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也是推广校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当前,每到上下学高峰期,中小学、幼儿园的门前总会聚集众多的私家车,使孩子们上下学变得险象环生,也成了众多家长和老人的沉重负担。而每辆校车的运行可交通减少36辆汽车的使用这一理念,理论上可使因接送孩子上下学而造成的交通拥堵状况缓解90%以上。

据了解,目前校车推广的一个关卡还在于家长们不接受,而不接受的原因还是安全问题。因此,提高校车的安全性能和司机专业化、职业化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另一个阻碍推广的硬性因素则是资金问题,很多经济不发达地区大都面临即使买得起也无法维持高昂的运营费用的尴尬局面。

外国专业车企抢夺国内市场

中国校车市场热度的升温,吸引了国际校车巨头前来掘金。北美最大的校车制造企业纳威司达现身这个展会上,或可预示外企布局中国校车市场已成现实。

资料显示,2011年纳威司达全球业务规模约140亿美元,其中海外业务约占20亿美元。在未来5年中,纳威司达将全力拓展海外的业务规模,而中国则是其不可或缺的一枚重要棋子。在未来纳威司达海外业务总量中,中国市场被寄望所占的比例高达20%。

此前,纳威司达与江淮汽车已签署柴油商用车发动机共同开发销售和意向商用车合作协议。随着中国校车市场升温,纳威司达有意将旗下中国IC Bus生产的校车进口中国,同时与江淮共同设计开发和经销在中国制造面向中国市场的校车。

网上俗称的“大鼻子”校车就是这家企业所生产,和其它车企的产品演示不同。

纳威司达中国科技总监、集团技术院士雷宁表示:“50多年前通过间接渠道向中国提供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卡车的就是纳威司达,如今公司能否迅速在中国市场打开局面,是关乎公司整体前途的一件大事。”

很多参加展会的家长表示:“最关心的还是要安全,不仅车的质量要好,司机也要有一定的驾驶经验,有很强的责任心和爱心。”细心地参观者会发现,此次参展的校车与以往不同的一个重要指标,那就是在学生坐席、司机坐席之外多了一个监护人坐席,这是在所有技术指标之外的一个人性化安全指标。同时车头设计、高强度防侧撞车身、防撞预警系统、停车指示臂、车厢烟雾探测器、专用学生坐席等一系列个性化设计都彰显了新一代校车的专业性。



王利博制图

挂面生产商也打“高新牌”

一批“伪高新”上市公司被迫缴税款股价下跌

■ 武彩霞

贝因美(002570)5月23日披露消息,因高新技术资格被取消,被迫缴税款2785.26万元。相关专家分析认为,随着国家经济增速和税收放缓,支出继续增加,对违规企业的查税力度还会严格,这类涉嫌“伪高新”被处罚的上市公司会越来越多。

贝因美“伪高新”股价腰斩

作为国内知名婴幼儿奶粉企业,贝因美23日公告显示,公司被认定前三年研发费用归集不合理、不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需在5月30日前补缴税款2785万余元。而在去年9月底,贝因美就因为被监管部门查实高新技术“掺假”而被追缴2008年、2009年税款共5892.7万元。

据介绍,国家审计署认定贝因美在2008年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时,前三年实际投入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65%;且申报的发明专利与其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不直接相关。

伴随“伪高新”事件,贝因美负面消息不断,9个月内连续两任董事长辞职,部分股东匆忙低价抛售股份。

其中4月23日和26日就发生三起大宗交易,成交金额达到1.16亿元,折价率在11.40%和11.63%不等。

受此消息拖累,贝因美连续两天下跌,5月24日收报21.04元,下跌4.36%。公司自去年4月上市以来,距42元发行价,股价已经腰斩。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根据规定,贝因美五年内不能再申请“高新”资格,所得税率恢复到25%,也丧失了土地、政策扶持等方面的优惠,这将严重影响贝因美未来的经营业绩。

涉嫌“伪高新”公司遍地

其实,沪深两市并非“贝因美”一家公司因为“伪高新”被查处,更有一些新上市或拟上市的“高新技术”公司因为相关数据不达标屡屡受质疑。

去年被审计署查实的“伪高新”还有主板上市公司东湖高新。公司去年6月20日公告披露,公司被审计署认定不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条件,不得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因此在6月17日补缴了被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1774.4万元和滞纳金490.27万元。

而在此前,已有华映科技、精艺股份等多家上市公司,由于相关指标没有达到高新企业认定标准,被税务

机关追缴税款。

目前,上市公司“伪高新”现象引起广泛关注,一些新上市或拟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因为相关数据不达标屡屡受质疑。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申请国家级高新技术资质的企业,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以上;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10%以上;销售收入超过2亿元的企业,近三年的研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不低于3%;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

但是公开资料显示,生产挂面的中小板上上市公司克明面业技术人员只有62人,不足员工总数的4%,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比例只有13%;今年4月在主板上市的奥康国际2010年获得“高新”认定,细究公司招股说明书就会发现,公司在研发人员构成、研发费用占比等数据方面与相关规定严重不符。

而拟上市公司志诚泰和则在招股申报书中称,公司虽然在2009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所得税优惠税率,但是公司高新技术企业的销售收入占比难以满足高新技术企业的评判标准。公司已按照

25%的税率向税务局足额退还182.35万元的税收优惠。

“高新”光环背后造假受罚风险剧增

英大证券策略分析师郑罡表示,随着首批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在去年底到期,需要重新认定,而国家经济和税收收入增速放缓,支出继续大幅增加,相关部门还会加大查税力度,一些涉嫌“伪高新”的上市公司被“追究”“现形”的机会越来越大。

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秘书长王守仁认为,上市公司“高新”造假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协作办理的,背后隐藏的核心问题是官商勾结、审查不严、蒙混过关。这一行为不仅侵犯了税法,更涉嫌资本市场欺诈,挫伤了投资者信心,更让国家相关审批机构和监管部门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一位长期从事资本运作的业内人士表示,他曾经被一家公司要求运作类似批文:“这一现象十分普遍,有了这类认定资格,就可以获得利益。要想避免这类事情发生,就要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和改进认定环节的审查,增加实地调查环节,同时严惩造假者。”